

的讲话。象多数庞大机构一样，联合国也有变成官僚主义化的牺牲品的危险。在它的议事程序中，僵化的危险越来越大；它有淹没在文件堆里的危险；各种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在继续增生，工作重复的现象看来也在增多。

168. 这与已故的大卫·欧文在初建秘书处时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而没有电话的情况比较起来距离太远了。只要能从大会每届会议三个月的消耗精力的压力下幸存下来，这本身就是一个成就。有一种把联合国的每一个决议都看作是目的本身而不是达到目的之手段的倾向。所有这一切均大有改进的余地。

169. 从根本上说，不是宪章出了什么毛病，虽然我们澳大利亚人将会接受对宪章的改动，如果这种改动被认为是必要的话。我们的眼睛必须朝别处看。我们杰出的秘书长在旧金山就宪章签字仪式二十五周年纪念发表讲话时，感人肺腑地号召所有会员国“给

宪章一个机会”，给它一个实行的机会，让它取得成功。

170. 巴西外长在这次辩论开始时〔第一八四一次会议〕发表的深思熟虑的讲话中提醒我们，尽管联合国有种种缺点和遭受到各种挫折，但它是我们仍然能够用以选择生活、和平和发展的唯一讲台。如他所说的那样，让我们利用本组织，让我们实行宪章吧。我们应该从心里接受这一忠告。

171.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决不可对联合国失去信心。我们决不可让自己不知不觉地陷入犬儒主义。我们应该时时记住已故的达格·哈马舍尔德的话：

“需要联合国保护的，不是苏联，也确实不是别的大国，而是所有的其他国家。从这一意义上讲，本组织首先是它们的组织。”

下午一时零五分散会

第一八四七次会议

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三日星期三下午三时纽约

主席：爱德华·汉布罗先生(挪威)

议程项目 9

一般性辩论(续)

1. 格雷罗先生(萨尔瓦多)：自从联合国宪章在旧金山签署以来二十五年已经过去了。在这段短短的时期内，科学和技术革命已经有了更大的发展，殖民地人民已经获得独立，贸易和交往有了增长，各种国际组织不断地将国与国之间的一切可能的合作领域都包括进去了。国际政策的性质已经改变，在国际组织中已出现了新的外交方式。回顾一下国际联盟，在那里现在联合国的大部分活动都可以找到一些先例，我们就能估量出国际社会五十年来所走过的路程。

2. 把联合国与一个理想世界相比，以为那里的各种问题总会得到迅速而明智的解决，我们对联合国就不能作出正确的估价；但是，把联合国同它以前的那个国际组织相比，我们就能够用切合实际的措词来对它进行估价。从这个角度来看，联合国无论在政治或技术方面都经受得起极其严厉的分析。

3. 既然联合国已经进入了第二十五年，估量一下形势就是很适当的了。因此，在本届大会期间，我们希望，除了一些深思熟虑的演讲外，还要采取措施对我们这个组织的行政方面作一番检查。联合国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它不需要再增设机构，而需要检查一下自己，研究其组织机构以及各种现行办法，使其能向纵深发展。

4. 值此联合国庆祝它的第一个二十五周年的年头，我国政府对于你，主席先生，担任大会的最高职

位感到特别欣慰。我怀着无限的激情回忆起你，汉布罗大使，在何塞·古斯塔沃·格雷罗博士担任国际法院院长时，你就和他结识了。你，汉布罗大使，是由一些强大的纽带与萨尔瓦多永远联系在一起的，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我国政府是第一批赞助你候选大会主席的。作为一个富有学识的宪章评注家，作为一个在各种会议上老成练达的外交家，你体现了各种国际组织的外交界的种种理想和经验。

5. 摆在联合国面前的问题是那样的多，有些是旧的，有些是比较新近的，我不想贬低任何问题的重要性，所有的问题都应听候各委员会讨论，我只想就以下几个主要问题发表意见：和平与安全、海洋法、第二个发展十年、普遍性原则以及宪章的审查。

6. 今年，那些主要的紧张地区以及那些甚至公开交战的地区已经有所减少。因此，人们希望各种明智的、现实主义的努力可以导致谈判，使谈判代替从实力地位出发的对抗。

7. 在近东，直到几天以前，地面上是一派凄凉和阴森可怕的景象，现在已露出一线光明，我们必须珍惜这一线光明，并且尽可能地使其扩大。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约旦和以色列三国政府决意开始并保持对话，我国政府谨向我们这三个友好政府表示良好的祝愿。这三个国家将要走的路程是漫长而艰险的。但是，正是因为它们要克服这许多困难，它们就应该受到国际社会的赞扬，并且还应得到鼓励，以便使它们将已经采取的立场坚持下去。一九六九年七月，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国发出呼吁，^①请它们运用它们在联合国的全部影响促使停火生效，这个呼吁是特别及时的，而且通过各友好政府的耐心说服，已经取得在联合国组织范围内开始对话的效果。这些努力是在联合国的行动机构的组织范围内并在它的支持下设想出来和加以发展的，这对我们这个组织来说，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8. 其他地区也是一样，一九六九年的各种激烈对抗已进入了一个退潮时期，而且对话已取得初步成果。例如：我们希望在中美洲，理智会胜过感情，而

且地理、历史以及和平共处与和平解决争端的各项原则将再一次成为这个区域政策的指路明灯。就此而论，我国政府坚持一个界线分明而且坚定不移的立场，这种立场在我国历史上最悲惨的时刻我国政府也对之忠诚不渝，而且准备以此来调整其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就是说，它是这样一条路线：合理而有理性的合作、保障基本人权、遵守国际法各项原则以及履行由正式条约规定的各项义务。上述国际法原则应作为一种法律体系来解释，其各组成部分是互相制约，并且互相作用的。

9. 在那些数目繁多而又性质复杂的裁军问题中，禁止使用化学和细菌武器已成为当前的主题。因此，忆及一个具有高度权威性的协定的存在是适当的：那就是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七日签订的日内瓦议定书。那个议定书的范围和意义在第二十四届大会时在第一委员会中讨论过。当时，我国政府通过它的常驻代表，对于上述议定书的范围和意义提出过自己的主张。秘书长提到的十四位专家关于化学和细菌武器的效应以及那些武器对物质和生物环境的影响所作的科学性估计的报告，^②为联合国在这方面采取行动的方向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因素。

10. 至于禁止使用那些为日内瓦议定书所明文禁止使用的落叶剂和其他各种毒气究竟应采用什么方法才能切实有效，我国政府认为，大会发表一些没有约束力的宣言并不是达到此种目的的妥善方法。正因为我国政府切望禁止使用这些极端现代化的战争手段，我们认为大会的一些简单宣言对于我们所追求的目的来说是太软弱无力了。我们认为，联合国应该开始走这样一条虽然比较缓慢但却稳妥可靠而且切实有效的道路，或者修订日内瓦议定书，或者议定一个新协定。

11. 再者，我国政府曾在第一委员会上明确地阐述过，而现在又在这次大会上重申，我们认为，联合国大会虽然没有解释条约的权限，但联合国有一个具有解释条约权限的机构，那就是国际法院，而且，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九十六条第一项，大会可以请求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

^①《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四年，一九六九年七月、八月和九月份补编》，文件S/9316。

^②《化学和细菌(生物)武器及其可能使用的影响》(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69.I.24)。

12. 正如业已说明的那样,我国政府谋求保证对此体系的各种机构的权限得到尊重,并保证其所创立的种种先例的必要的一致性,使其成为解释及发展宪章的法理体系。

13. 当然,我国政府对于我们向来在其他各种国际会议上一贯坚持的原则仍然是信守不渝的,那就是在国际法的两个来源,条约法和习惯法之间划一条非常明确的界线,并且拒绝承认条约法的来源,仅仅因为它经历了一段时间就被认为是习惯法的来源了。因履行条约而采取的各种行动,不能被认为就会产生习惯法。所以,我国政府对于有一种论点是不能同意的,那种论点认为凡起源于欧洲并且根据欧洲情况而构想出来的各种条约,都成为完全有效的国际习惯的来源,因而对于那些没有在条约上签字的国家也同样具有约束力。我国政府曾有机会在各种适当的会议上对这个问题详细阐明过自己的观点。如果我现在援引上述日内瓦议定书以及我国政府还没有批准的其他一些国际协定作为论据的话,只是因为我们认为那些协定的条款内容有价值,并不因为它们具有什么约束力。

14. 在一种公认的应当保留海床洋底专供和平用途的原则影响下,一个旨在禁止在海床上安置核武器的条约草案^③的第一步正在着手进行。那个由美国和苏联共同起草的草案是一九六九年大会研究的对象并交回裁军委员会会议。在本届会议期间,大会将对那个条约草案的新文本进行考虑。

15. 我国政府在第一委员会辩论期间曾确定过我国对于该条约草案的立场。我国的立场是:我们完全支持保留海床洋底专供和平用途的原则。我们也赞成禁止在海床洋底安置核武器和其它各种具有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可是我国政府同时认为,过早地判断海洋法的其它各种问题的解决办法并就此问题签署国际协定而结果却使各沿海国家的利益和权利遭受侵犯,那是令人不快而又不明智的。萨尔瓦多不是一九五八年四月在日内瓦签订的关于领海和毗连区公约的缔约国。那个公约在其存在的十二年中,得到了三十六个国家的批准,由此可见,它并没有得到普遍的承

认。所以,把那个公约的各种概念纳入一个关于海床洋底无核化的条约草案中,就等于预先假定那些只反映国际社会一部分国家赞成的准则具有约束力。

16. 在我国政府拥护条约的要旨和目的的同时,我们却不赞成说它具有解决其它问题的含义。这些问题应该通过海洋会议直接谈判来解决。禁止在海床洋底安置核武器应是正式国际协议的目的,但是它并不意味着——更确切地说,那样是有损于许多国家的利益的——接受公约中关于领海和毗连区的某些条款。禁止在海床洋底安置核武器是能够通过直接划分地区而达成协议的。该地区包括一片受国家管辖地带的事实与协议的达成毫不相干。以区分国家和国际地带作为条约的目的是不恰当的。在这一点上,如果其他协议的含义略去不计的话,该条约就完全能够规定这个地区应从距海岸线十二哩的地方开始划分。

17. 我国政府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侵略定义问题特别委员会的工作,并满意地看到特别委员会的工作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尽管存在着代表相反的政治利益的对立思想学派。两种论点是互相矛盾的:一种是以一些基本因素为基础而下的一般定义;另一种是通过列举现时能够想象得到的事例的迹象而下的定义。第一种从学术观点上看是更为专门的论点,留有广泛解释和运用的余地,因此,是一些国家所不能接受的。第二种达到了安全和确切的标准,但对于预见的情况有列举不够充分的危险。如果下定义是指出一种观念的界限范围和意义,那么,这两种论点都相当于国际法中可被认为的基本政治定义,但是,依照逻辑规律,还是第一种论点将获得赞同。

18. 侵略定义不是一个孤立的课题,更确切地说,它是与合法的自卫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合法的自卫就会改变一种暴力行为的法律定义。同样的暴力行为,就其具体因素而加以考虑,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成为侵略,而在另外的情况下可以成为合法的自卫行动。另一方面,侵略不应只从跨越边界使用暴力的观点来看,而且还应从违背国际法和国家间友谊与合作的基本准则,使用暴力侵犯别国的基本权利的观点来看。此外,一经违背便构成侵略的这些原则和准则应视为制度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这样一个定义不能当作只意味着对一些孤立事例指出范围,相反,这

^③《裁军委员会正式记录,一九七〇年补编》,文件DC/233,附件A。

个定义必须承认种种主要国际原则是多方面互相制约的。例如，崇高的主权原则就不能用来轻视和践踏别国的基本权利。

19. 最使人遗憾的是，经济侵略问题竟没有列入上述特别委员会的最近计划，因为在当今世界上，经济侵略在某些情况下取代了武装侵略。经济侵略只要它继续得到国际组织的宽容和默许，就将在有组织的世界共存制度中造成一个缺口，继续起着毒害国际关系的极坏作用。当经济侵略表现出持久而激烈的特点时，它就具有一种新的特性，因为在那时挥舞经济武器是有意图的，这些意图具有和战争武器一样的破坏性。其目的和效果也是一样的，因此，它们应该受到同样的法律限制。

20. 这类问题应由特别委员会加以研究，以便正确地履行其使命。我们得出结论的时间花得越长，联合国所象征的伟大的共存任务陷入无底深渊、混乱和谩骂中的危险就越大。

21. 因为萨尔瓦多不是特别委员会的成员，所以，在考虑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时，我们就有机会向第六委员会提出我们对这个重大问题的意见。

22. 几乎没有什么问题曾象加强国际安全这个问题引起那样大的兴趣，因为各种有益的结果都来源于安全，其中包括把军备投资转用于可能性尚属渺茫的发展事业。

23. 国际安全是与原子武器的废除和处理政治合作、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发展的国际组织的有效和公正的工作紧密相联的。联合国取得了一些成就，例如有关南极、^④外层空间〔第2222(XXI)号决议〕和拉丁美洲^⑤非核化条约等。我国政府特别对特拉特洛尔科条约感到满意，这个条约规定在拉丁美洲领土上废除原子武器。目前正在谈判过程中的关于在海床洋底禁止安置原子武器的条约会大大地增加世界上禁止使用原子武器的重要地区。但是在其他地区，特别是在各大国和他们的军事盟国的土地上，原子武器的积累仍

然在不断增加，并且载有氢弹装备的潜艇还在世界各地的公海里游弋。那些武器足以使人类毁灭，把地球变成渺无人烟的行星。因此在某些地区废除原子武器给人类带来的宽慰只是有限的。从一个更全面的角度来看，这对于人类摆脱因进一步控制自然而陷入困境或罗网，并无多少帮助。对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2373(XXII)号决议〕也可说是一样的。这个条约限制拥有原子弹的国家的数量，当然也减少了发生大灾难的风险，但它却允许原子俱乐部的成员国保存他们的能力，以决定人类是幸存呢，还是变成几千年后可能被来自其他星系的古生物学家所发现的化石。

24. 国际安全这个项目应保留于大会议程中，但要求比一九六九年的大会进行更详尽的讨论，那年的大会面临着几份宣言草案，最后都归入第2606(XXIV)号决议。那个决议只局限于表明善良的意图。在那些善良意图中，至少有一个含有向大会的挑战。因为它表示希望在本届会议，即联合国庆祝其第一个二十五年期间，能提出一些加强国际安全的适当建议。为了和大会的目的取得一致，我国政府希望在适当的时候，向有关机构递送一份具体的建议，这份建议将把这个项目提到比那些善意宣言更有实效的高度，因为这种宣言的直接结果只是去填塞联合国组织的档案。

25. 关于海洋法和海床洋底问题，萨尔瓦多参加了关于海床问题的四十二国委员会。^⑥我们在这个委员会中的贡献受到了其他成员国的友好欢迎，他们委托萨尔瓦多的常驻代表任法律小组委员会主席，我国政府对这种信任和友好的表现表示感谢。

26. 大会通过第2574B(XXIV)号决议要求海床委员会加速研究一个综合性和均衡的又可能被国际社会接受的原则宣言。委员会为了满足大会的需求而不倦地工作。虽然今年它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以一九六九年法律小组委员会报告^⑦的第二部分结尾中所包括的综合的内容与在日内瓦举行的夏季会议后期传阅的非正式文件作一比较，就能证实这些进展——至少还有五个主要问题虽不是不能解决，但需要以更大的努力和更大的创造性把它们变为公分母，这就可能成为取得意见一致的目标。海床委员会在它两年的工

^④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签订的南极条约。

^⑤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在特拉特洛尔科签订的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

^⑥和平利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床洋底委员会。

^⑦《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四届会议，补编第22号》。

作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比过去能更好地执行任务。然而它要解决的问题是特别复杂的,它涉及的对象是各种不同的而又往往具有对抗性的利益,因此需要的不是在理性的基础上寻求完善的解决办法,而是在妥协的基础上寻求政治的解决办法。

27. 海床委员会的任务是当前联合国正在进行的最复杂、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如果这是一种学术性的活动,委员会早就产生一项原则性的宣言了,但它涉及的问题是:一些重大的政治决议,海上强国的利益,有着广阔海岸线而又缺乏能力开发海上资源的各国的利益,具有先进技术的国家的利益,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有内海的地区的利益以及面临广阔海洋的地区的利益——这些是一系列代表各种不同情况和利益的问题当中最尖锐的问题。

28. 应有一项单独的原则性宣言。这个宣言应成为建立制度的指南,并且应该用简单而概括性的措词来陈述。这个制度不应忽略标准的多种状况以便使它提出的标准也考虑到一些特殊情况并达到国际公正。

29. 我国政府认为细节及一些具体条件所造成的障碍妨害了就原则达成协议,因为它们的内容使一些国家难以接受。达成协议的途径在于条文的简单、明了、概括。一旦试图提出具体内容,我们势必陷入纷争。对原则的拟定,简明和概括是适宜的技巧。当然,如果问题是对海床洋底的制度求得一致意见,具体条件及具体方案还是不能回避的。

30. 宣言中所包含的方案,对海洋法有争议的论点不应事先加以判断、暗示或设想。如果企图通过原则宣言为解决其他问题而捞到便宜,我们就会走入死胡同,并且无可怀疑地将抛弃履行委员会职责的愿望。比如,这样的方案对大会关于法律上义务的延期履行的期限,对区域的限制,对沿海国家权利的限制以及对某个临时制度的有效范围都不应事先判断而表示赞成或者反对。

31. 但是,原则宣言对于专属有关海床洋底的使用的某些基本问题必须加以详细说明,如承认海床洋底为全人类共同继承的财产,资源的开发应为全人类利益而进行,国际组织应负责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

管理事务,特别应力求保证服从根据条约而建立的制度等原则。

32. 确定宣言原则的性质最为重要。目前,如果把宣言视为这个制度的指导方针,那么,就能找到共同点,因为这个方针能排除很多国家不能接受的那种解释法,即可以把这个制度解释为一种临时制度。

33. 秘书长应大会的请求〔第2574A(XXIV)号决议〕,就举行一次海洋会议的可能性进行磋商。我国政府响应这一磋商,并强调新的海洋会议在其性质上不应受到限制。反之,其目的应该广泛,以便对有关海洋法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加以研究,同时使其他虽然已有一般性协议而尚需进行规范性修改的问题符合现代的要求。

34. 我国政府反对召开对议程事先加以限制的会议。这样的会议也许只包括有利于海上强国及发达国家的议程项目,却把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议题搁置一边。这样,就会丧失使各国间互相了解的可能性以及系统地共同地处理各种不同问题的可能性,同时可能丧失应作为贯穿国际海洋法一些章节的协调感与均衡感。

35. 当然,依照我国政府所主张的条件而召开的会议,不会由于议程项目欠严谨及项目过多而冒失败的危险。如果会议开成一次广泛的、综合性的会议,把有关海洋法所有未解决的问题都包括进去;而会议委托一个筹备委员会来负责,该委员会经常与有关国家进行磋商,对议程所作建议如果超过一定期限则不予采纳,那末,归根到底,这样的会议还是一个有一定范围和明确的议程的会议。换句话说:与那些要求召开限制性会议的国家的分歧,在于它们要求在召开会议的信函中明确规定议程项目,但是,我国政府认为,会议的召开应具有广泛性,议程项目应在筹备过程中确定。会议必须充分准备,周密考虑,不应临到开会才仓促行事。为了修正和使现代海洋法中最敏感的部分完善起见,对于一切未解决的问题,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应给予统一、均衡和协调的处理机会。

36. 国际法是欧洲人为了适合欧洲的情况而构想出来的。随着新情况的出现,又增添了几项拉丁美洲

的关于国际法的学说。但国际法的欧洲作者反对采纳这些学说所进行的抵制，以及他们在国际法庭中遇到的种种困难是尽人皆知的。语言是新成立的亚非国家研究这些拉丁美洲的陈旧法律学说的障碍。我国政府相信发展中国家确有兴趣对国际法的改进作出贡献，又相信正如它们曾经反对了政治上的殖民主义那样，将准备堵塞通向精神上的殖民主义的道路。当然，如果这一目的成为现实，它必然具体表现在一切国际会议中的明确和一贯的政策上。

37. 谈到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它在世界性发展政策方面所发挥的极为重要的作用，就其发展战略而言，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在第二个发展十年上。

38. 大会将考虑起草一份能够成为全球性发展战略的宣言〔A/7982，第16段〕。处理这个世界范围的问题本身就是很大的进步，因而也是值得我们赞赏的。

39. 草案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同利益的一种妥协，它并且考虑了联合国成立以来所执行的政策。经验表明这种政策是不适当的。第二个发展十年出现了一个带根本性的缺陷，在今后几十年中也还会出现这样的缺陷，因为我们还未能使发达国家相信，发展中世界的经济发展也就是它们自己的发展。发展应从相互经济利益上看，而不应从政治影响上看，因为发达国家比穷国来说可以成为更好的买主。

40. 指出近几年来世界政策方面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也许是适宜的：就是在广大地区和超越意识形态的范围，发展中国家政治上的团结与利益上的日趋一致。

41. 发展作为一项世界性规划，应该促进较不发达国家自行积累资金；因而广泛的贸易措施就是最好的手段。通过贷款和投资转移资金只应是辅助的因素。只要世界贸易还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对于发展来说，就缺少一个起作用的重要核心。有的国家将负债日多，其结果势必以分期偿还债务以及利息和利润等形式重新输出比他们的所得还要多的资金。

42. 在联合国各项业务中没有一项全面地处理传授科技的业务，因此，这个有关发展的极其重要的

方面是支离破碎地进行的。关于这一点，期望增强和协调当前各种活动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454(XLVII)号决议已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有关这个问题的业务可以协调起来，这方面的工作可以在明确的、协调一致的政策指导下来完成；这样的协调可以导致行政活动的统一。这是第二个发展十年带有决定性的问题之一，要求着重地、直接地、全面地解决。

43. 可以想象，第二个发展十年不会扭转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别形成两个集团的不可调和的趋势，这两个集团继续逐渐分离。十五年后，即使所提出的战略的大部分政策已被采纳，两个集团间的鸿沟也将加倍扩大。

44. 希望发展中国家在第二个发展十年的前五年达到每年百分之六的增长率，可能是现实的。对于这个增长率，草案中说得不清楚，好象表示一种微弱的希望，“在发展十年的后五年有可能达到更高的年增长率”。但是草案中没有提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两个集团的增长速度的比率。

45. 筹备委员会的报告中谨慎地指出，在第二个发展十年中，如果保持按人口收入百分之三点五的平均增长率，就有可能“至少在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生活水平的差距上有一个适度的开端”〔A/7982，第16(13)段〕。这个按人口收入的适度增长是否真能开始结束这个差距还是个问题。让我们举出一些数字来说明吧。假定，某些国家按人口年收入为三百，而另一些国家为一千二百。三百增长百分之三点五，第一年就会达到三百一十点五。但若那些按人口收入为一千二百的国家，实现增长百分之二的收入——且不说象前者一样，按人口收入增长百分之三点五——第一年就会增长二十四。从第一年开始相对的增长就不表明两者相对差距的缩小，反而是增大了。假定起点为一千二百的国家的按人口收入为百分之一的增长，即使这个微不足道的数目——这个数目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是无足轻重的，因而作为一种假设是不能充分说明问题的，除非有意贻笑大方——也会使它们有十二的增长。十二比十点五多，这是显而易见的。

46. 第二年收入为三百一十点五的国家——增长百分之三点五——就增加十点八六；但是，收入为

一千二百二十四的国家——增长百分之二——其收入将增加二十四点四八。如果以后者为例，我们假设增加百分之一——这个数字作为发达国家的增长率，会是一个荒谬的数字——并且假设第一年也增加百分之一，按人口收入就增加十二点一二，而这个数字高于十点八六。

47. 我举出这些数字为例，目的是想说明我们不理解，通过当前的战略怎么能使第二个发展十年成为“在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生活水平的差距上有一个适度的开端”，如在上述关于发展战略文件中所宣称的那样。

48. 从讨论中的复杂的世界贸易安排，我们了解到特惠方案的安排。关于这个问题，对非洲国家有利的欧洲特惠使人想到洲内特惠。但我们不能一错再错。在最后决定世界贸易方案以前，我们应致力于消除现有的区域性特惠，并用世界各地区的国家都可以接受的普遍特惠来代替它。幸亏，这个战略草案有利于普遍性、非互惠性、非歧视性的优惠待遇。

49. 现在我谈谈联合国的普遍性问题。我们在宪章里载有普遍性原则。因为，联合国按其职责，而且如果它要具有有效性，就必须具有普遍性。联合国二十五年来所遇到的许多障碍，都起因于这个原则未能成为现实。但是，这个缺陷不能推卸给联大、安理会或某些政府，因为这个缺陷正是渊源于这个组织本身。事实上，联合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敌对情绪仍然激烈的情况下诞生的。这就说明了宪章第一百零七条关于敌对国家的规定的內容。

50. 普遍性是一个原则，而不是标准。它必然促使产生一种政策而不是一个包含有解决特殊政治问题的直接行政命令。有些重大的政治问题，特别是关于因内乱或国际战争所造成的民族国家的分裂，不是单纯靠引用普遍性原则所能解决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普遍性成为现实，就有必要正视问题并尽力去解决它们。关于普遍性原则，联合国并非因其二十五年间未能使这一原则生效才停滞不前，而是因为它缺乏它在处理某些问题时表现过的那种兴趣、想象力和现实主义态度，并且更加微妙的是，还因为它已经形成了安于现状的习惯。这种习惯对目前很方便，但不久的将来

来就会产生更大的问题。普遍性必须存在下去。但是不能伤害民族感情和违反其他原则，如自决和民族独立等权利——不能孤立地理解普遍性，而应把它理解为一种体系，它的各部分是相辅相成的。

51. 除了一些长期熟悉的问题外，普遍性在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涉及所谓微型国家问题。给一个微型国家下定义是不容易的，它可能是各种因素凑合的结果，如领土、人口、国民生产以及对联合国正常预算的捐助能力。如果参加联合国采用这种限制性的准则，就会开创一个将来容易援引的先例。一旦采纳了这种限制，这些限制就会跟着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预算的摊款趋势而变化，换言之，这些限制条件就会上升。一旦收入调整了，那就无法阻止人们怀疑其永久性。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由于要以物质和财政考虑为条件来接纳会员国，联合国就会变成一个排他性俱乐部而告终。当代国际社会中的原子俱乐部就是这种排他性俱乐部的先例。

52. 微型国家的定义无论怎样带限制性都适用于当今联合国的一些会员国。没有人提出，的确也没有人想到，一个联合国的会员国可以被剥夺它既得的权利。但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即一个微型国家成为联合国的一个正式成员国，而条件与之相同的另一些国家却不能成为正式成员国。其原因却不在他们本身，仅仅是因为在非殖民化的过程中他们获得独立晚一些。

53. 联合国宪章第四条对大、中、小国家或微型国家没有加以区分，而相反的是在普遍性原则的激励下只提“爱好和平之国家”，按本组织的意见，这些国家都能够履行它们所承担的义务。我们的意思是，如果它们愿意的话，要履行所有的义务，包括财政义务。

54. 在纪念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之际，普遍性问题已谈得很多。修改联合国宪章以缩减联合国组织的总人数，似乎与之不相协调。我现在谈谈联合国宪章的问题。在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之际，大家已考虑了审查宪章的必要。有一种传播较广的意见，认为二十五年前激励促成联合国创立的目标只部分地达到。面对这种衡量就引起这样一个问题：其原因是否宪章有缺陷，而这些缺陷是可以通过协商、对宪章作

出修正来弥补的；或者是否由于一些更深刻的原因，这些原因触及国际政策核心和各国的意愿。而这些国家并不象二十五年前那样倾向于依靠多边的外交了。

55. 我国政府认为，我们不能推延考虑修订联合国宪章的问题。这意味着我们应有机会通过对联合国宪章的评价，而对各会员国的意见和建议作出估计。无论结果怎样，这样做都会证明这是一个有益的行动。

56. 我们在联合国第一个二十五年中所见到的它的无能或许不是对宪章仅仅作出修改所能克服的。因为它的缺点的内在原因埋藏得较深。正如各国情况一样，我们了解到在国际生活中问题的解决不仅要通过改革的立法而且要通过弄清原因和调节社会、政治及经济等方面因素的过程才能达到目的。然而这并不妨碍求得各种更好的法律的愿望，倘若它们是最适合实际情况、而不是适合乌托邦世界的那些法律。

57. 此外，如果要考虑宪章的修订，我们应有一个可供参考的论点和核心，围绕这个论点和核心，我们可以研究国际社会的一些重大问题。各国政府就能各抒己见，取长补短。不过我国政府并非不知道，不仅在对宪章作出可能的修改问题上，而且对开始考虑这一题目的可能性方面，都存在着各种障碍。这说明国际社会是被宪章置于这种脆弱的均势之中，这种均势在这二十五年中已经僵化和瘫痪。要把这种情况跟最初十年充满信赖和信心的开创年代相比，已变得更加不稳定了。

58. 我国政府不赞同联合国大会每年对各种各样的问题作出数目可观的决议。然而却主张对那些带建设性的、有益的、属于它的职权范围内的议题、措施和条款重点进行讨论并作出决议。即使对那些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问题，我国政府认为，现在是根据问题的轻重缓急制定一项限制标准的时候了。联合国组织的威望和有效性要求这样做，特别是在加拿大代表团最恰当地提出了有关大会的组织和程序的合理化问题的时候更是如此。但这种合理化的需要不仅涉及程序、项目的分配和各委员会职权的调整，还必须深入到各项目、各议题的实质以及贯穿我们整个审议和建议的精神中去。

59. 然而，要是没有联合国的话，我们就必须立

即创建其他的国际组织。在对联合国提出大量批评的时候，我甚至可以说，这些都是应得的批评，但没有人当真地想搞垮它。这样的批评，毕竟是对这些国家自己的批评，是对这个组织成员国的批评。它反映出国际社会的盛衰。联合国的成败是与会员国休戚相关的。对联合国的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各会员国的批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自我批评。当我们向联合国提出要求时，我们必须冷静地考虑，我们准备付出什么代价才能达到我们的要求。

60. 联合国宪章没有反映出和平的取得和正义的实现两者之间的真正均衡。根据条件和内容来检查，并从一系列因素的基础上来观察，国内和国际和平总是与正义联系在一起。但只是在和平反映一种表面现状时，和平才被认为是与产生它的条件和原因脱离而成为互不相关的现象。在宪章里正是这样对待和平的。宪章把正义置于附属的、且不说是边缘的地位。在第二十四届大会上，在对二十五周年大会口号进行了持续几小时的激烈争吵后，才把“正义”这个词写进去。但它在各种声明中却常常占了优先地位。当政治论坛上试图解决某些冲突时，一旦援引正义，巫术般的气氛就会笼罩着整个问题，但是没有人敢于公开承认这种气氛，于是便采取一种怀疑的、图省力的和任意的态度，很象一个扮演几种剧情的角色，只不过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什么是正义？”而不是“什么是真理？”。

61. 如果宪章要加以修改的话，使联合国改弦更张，朝着对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两个同等正当而相互关联的目标前进已是时候了。

62. **法西奥先生**(哥斯达黎加)：主席先生，你当选为本届大会主席，说明你作为一位对联合国具有渊博知识的熟练外交家的才干得到了公正的承认。你的当选对你的国家挪威来说，也是一种应得的敬意。这也是忠实履行联合国宪章的典型民主的体现。因此，我国代表团高兴地象以上所有代表团在他们发言开头讲的那样，谨向你表示祝贺。

63. 能在本届大会上代表已将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变成自己国际行为基本准则的一个国家，这是我的荣幸。因此，今天我能毫无保留地断言：哥斯达黎加

在解决经济、社会、文化、科学与人道主义等问题时，总是坚持各国主权平等、各国人民有自由实行自决的权利、和平解决各项争端、尊重人权、不干涉内政、国际合作等项原则，坚持这一切原则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

64. 自从联合国成立以来，四分之一世纪已经过去了，某些人对联合国在这期间所取得的成就持悲观论点，我国代表团并不赞同这种论点。尽管联合国存在种种局限性和遭到种种失败，但联合国还是设法防止了爆发一场普遍战争，从而使人类的一大部分免受联合国宪章序言中所说的那种“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这一成就的本身就说明联合国存在理由，但它所取得的成就还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这就要求我们作出更大的努力，使本组织能更有效地执行其维护和平的任务。

65. 联合国为对国与国之间所存在的问题发表意见提供了一个适当的论坛，如果没有这一论坛，这些问题就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除非发展到武装冲突，问题闹到不可开交的地步才会引人注目。这样就造成一种具有警惕性的国际舆论，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国际舆论是很强烈的，足以对那些想保持一种不公正态度的人加以劝阻。

66. 在联合国成立以来的二十五年内，它已加速了非殖民化的进程，并以前所未有的形式增强了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自决的权利。

67. 联合国还执行了极好的技术和教育援助计划。尽管联合国在经济领域内只取得了相对的成就，但它在这方面还是促进了国际合作。联合国在发展问题上所作出的研究，虽然并未有效地被利用来填平穷国与富国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然而还是使造成三分之二的人类深受折磨的贫穷的国际根源更为明显了。这些研究进一步强调需要工业化国家对穷国的发展予以合作，以此作为维护工业化国家本身繁荣的唯一途径。

68. 显而易见，虽然在这二十五年内避免了普遍战争的灾难，但却从未有过一次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和平。联合国组织未能解决某些处于武装冲突的国家以及一些国家集团之间所面临的尖锐问题。由于正义得

不到伸张，暴力行动仍使人类的大部分深受折磨。尽管有了联合国，许多国家的人民仍然在被剥夺了自由的状况下生活。

69. 我们必须坦白地承认，联合国无能力解决武装冲突和避免非正义局面的出现，是由于许多会员国，主要是那些最强大的会员国，拒绝将它们的主权限制到使联合国成为维护和平的有效工具所需要的程度。对于这些武装冲突，我们的组织已降低到仅仅是阐明各种理论和形成国际舆论的一个中心了。这是一种不容忽视的状况，而它远离了那些联合国的缔造者以及后来坚持联合国原则的人的基本宗旨。

70. 要在越南结束一场残酷战争的希望，今年和去年一样不大可能实现。这个花费很高代价所换来的经验表明，使用军事手段并不能解决冲突。不过，在谈判方面并未取得丝毫进展。巴黎谈判是在没有预示任何进展前景的气氛中恢复的。

71. 必须承认，美国政府为了创造更适于谈判的气氛已经作出了积极的努力。美国政府不仅在一年多以前停止了对北越的轰炸，并已从南越撤出了大批部队。但是另一方却并未对这些表示作出相应的回答，也未表明丝毫想进行谈判的愿望。那些制定种种先决条件的人是不能进行谈判的，因为承认这些先决条件就意味着将单方面的观点强加于人，这就是拒绝进行谈判。

72. 南越和美国提出切实可行的和平建议的主要目的有二：撤出一切非南越部队和举行由所有南越公民参加、并在国际监督下进行的自由选举，选出在敌对行动结束后执政的政府。那些口口声声自称他们是维护南越人民自决权利的人是应当采纳这些公平合理的建议的。然而，他们只接受从南越撤出盟国的部队，以及推翻那个国家经正式选举所产生的现政府。那些想不惜任何代价，独断专横地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顽固不化的态度所造成的可怕后果，就会使一场毁灭生命财产的残酷战争延续下去。

73. 令人奇怪的是，那些敦促南越及其盟国作出更多的让步，以便使巴黎谈判取得进展的人，却从未想到过要北越政府或越共同样作出让步。我国政府希望：为了世界和平，那些拒绝谈判的人所采取的僵硬

态度会有所转变。只有这样，南越人民才能在不受外国干涉和没有任何国内暴力行动的情况下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只有得到国际上公众舆论的支持，这种解决办法也才会持久有效。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联合国能够而且必须为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作出贡献。

74. 中东冲突仍然是对世界和平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威胁。再没有其他局部争端或局部冲突如此严重地充满着演变成一场世界大战的危险。联合国之所以既不能轻视这一问题，又不能听任各大国去解决这一问题，其原因就在于此。联合国必须尽一切可能寻求解决这一危机的途径。过去二十二年内，这一危机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曾引起了三次战争。

75. 当获悉有关各方接受了美国关于暂时停火，并通过雅林大使先生的调停开始进行谈判的建议时，哥斯达黎加政府与在座的大多数政府同样表示满意。同时，由于有关的一方并未切实履行停火协议的条款，以致使谈判一直未能开始，哥斯达黎加政府也和座的多数政府一样，对此感到遗憾。尽管如此，为了使谈判能开始进行，我国代表团仍然希望违反协议的行为将得到纠正。由雅林大使主持的这些谈判必须创造一种良好气氛，以便使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能够象一九四九年那样重新会晤。当时的谈判是为了达成一项停战协议，而现在的谈判则是为了商谈一项和平条约。

76. 直接谈判作为最终结束各国之间的敌对行动并促进持久和平的一种方式是无法用别的方式来代替的。但是为了使谈判名副其实，它就不能受一些意味着要一方作出一定让步的先决条件的限制。为了寻求解决冲突的一切根源的办法，谈判必须是坦率而明确的。

77. 阿拉伯各国政府曾于一九四九年宣称：各军事停火线不能解释为政治分界线或领土的边界线；这些边界线应在向和平过渡的过程中通过协议的方式进行划定。既然从未达成这些协议，那么通过雅林先生进行会谈就不应受先决条件的限制，即以色列应将其军队撤退到边界线以内，其实这些边界线就从未存在过。

78. 为了使以色列能完全履行要求以色列撤退

其占领军的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首先需要通过一项和平条约将这些边界线固定下来。以色列从未拒绝将其军队撤至一九六七年的停火线，但是，从逻辑上来讲，基于三次战争和二十二年持续不断的战争状态的沉痛教训，就有必要将军队撤退到安全而稳定的边界线去，这些边界线应由交战各方在和平条约中予以完全承认。哥斯达黎加认为以色列的这一立场是公正的，因此我们公开给予支持。

79. 根据我国政府的观点，我重申在近东促进和睦的最好方法是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由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人进行直接谈判，以便结束一场延续了二十多年的血染圣地的冲突。我国政府认为，联合国应充分运用其巨大影响，进一步发挥其机智，全力以赴地为尽快开始进行直接谈判而贡献力量。

80. 为此目的，各大国必须克制自己，不为猎取它们自身的政治或战略的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近东地区的冲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岂容在这里玩弄争夺势力范围的游戏。如果阿以冲突能摆脱各大国为了使世界力量对比有利于它们而玩弄的阴谋，那就比较容易使冲突双方坐下来谈判，结束相互间的敌对行动，并实现和平。这种和平将是处于近东的各国人民之间进行巨大的合作的开端，甚至是具有某种形式的经济一体化的开端。

81. 用这种方法来分析当前的武装冲突，我可以满意地宣告：中美洲已继续朝着巩固和平的方向迈开了坚定的步伐。为了寻求一项切实解决惨痛的武装冲突的办法，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之间所进行的双边谈判已因发生边境事件而中断了。要在谈判双方还存在着冲突的时候进行谈判是困难的。去年美洲国家组织曾经非常成功地使有关各方实现了停火，但却未能使他们达成一项边界非军事化的协议，而为了防止发生新的边界事件，上述协议是必要的。

82. 在哥斯达黎加总统何塞·菲格雷斯先生就任国家总统当天提出的倡议下，中美洲各国外交部长于五月底在圣约瑟举行会议。这次会议上，在危地马拉、尼加拉瓜与哥斯达黎加的担保下，萨尔瓦多与洪都拉斯之间缔结了一项关于沿边境全线建立和平与安全地带的协定。这一地带的监督任务由美洲国家组织

任命的拉丁美洲军事观察员执行。由于这项圣约瑟协定，边境事件不再发生了，为了获致永久和平，已经恢复了双边谈判。

83. 这场冲突的解决使五国经济事务部长以及后来的五国外交部长能在马那瓜和危地马拉举行会议，在那里通过了特别程序，以再一次推动中美洲一体化监督机构工作的进行。在将中美洲维持和平的工作取得成绩的消息通知本届大会时，我国代表团表示愿意看到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正在进行的双边谈判取得令人满意的积极成果，因为我国代表团深信，只有这样的谈判才能导致持久和平。我们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一向是为有关双方能毫无拘束地进行谈判创造种种条件和给予种种必要的保证。不过，谈判的双方，而且只有谈判的双方，才能真正解决它们自己的问题。直接谈判是一种手段，它能将花言巧语和论战形式的辩论加以转变，使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得到明确、详细而具体的阐述。

84. 我们对直接谈判的信念来自中美洲的经验。正是由于相信直接谈判，才促使我们吁请联合国竭尽全力使尚未解决冲突的双方一道坐下来举行不附加先决条件的直接谈判。凡是拒绝直接谈判就会造成紧张和疑虑，而直接谈判往往会使新的见解和富有创造性的新的努力得到发挥的余地；这些新的见解和努力往往又会促使双方言归于好，而在会谈开始前是不存在这种可能性的。

85. 空中劫持行为日益频繁的程度十分惊人，这种行为对和平来说是一种严重而不安的因素；因为这种行为构成了一种海盗行径，它在道德上、政治上和法律上都是非正义的；因为对于给这些空中劫持者提供庇护所的国家来说，这种行为还构成了侵略行为，而这一行为是违背受害国的利益的。在最近通过的第286(1970)号决议中，安全理事会建议各会员国应采取一切相应措施来防止重犯空中海盗罪行。我国代表团高兴地支持这一决议。在通过这项决议之前，哥斯达黎加已经采取种种必要措施，以便将空中劫持活动定成一种新的特定的犯法行为。最近所颁布的刑法规定对这种犯法行为将给予严厉的制裁。

86. 尽管如此，我国代表团还是认为，制止空中

劫持行为的最好办法就是促使已经给空中劫持者提供庇护所的各国政府纠正自己的作法，并促使其同意将这些空中劫持者提交对发生空中劫持事件拥有管辖权的有关国家的司法机关处理。如果提供庇护所的各国政府并未积极共谋，种种空中劫持行为就不会如此容易得逞。那些空中劫持者受到怂恿进行犯罪活动，正是因为他们确切地知道犯罪后可以逍遥法外，甚至还会被当成暴力行动的英雄，而不致被当成对人类犯有罪行的犯人看待。

87. 不幸的是，正是美洲一个国家的政府，即古巴政府开创了庇护空中劫持者的罪恶先例。古巴的这一政策是它对美洲其他政府的颠覆性活动的必然产物。其他国家的政府很快就争相效尤这种政策，以暴力行动去对付和它们有冲突的各国的飞机和乘客。这样一来，提倡暴力者找到了对他们不满意的事态进行抗议的另外一种手段。如果古巴政府将首批空中劫持者逮捕法办，并按国际法规定，将他们交由受权处理这些人的各国法庭处理，我们今天也就不会以极其惊恐的心情目睹这些层出不穷的对飞行中飞机进行袭击的事件了。

88. 正象我所讲过的那样，庇护空中劫持者就构成了对被劫持的飞机有管辖权的国家进行侵略的行为。当一国政府给予这一庇护时，正象在大多数情况下一样，该提供庇护所的国家就应受到制裁。安理会必须对那些犯有侵略行为，可能威胁各国之间的和平的政府强行给以制裁。只要缺乏勇气承认这一真理；只要不要求违法的各国政府停止给予庇护，空中劫持事件将继续危及所有乘客的安全，并将危及国际社会所依赖的完整秩序。

89. 我们在这里高兴地指出：哥斯达黎加曾与其他许多代表团一道，支持过第2544(XXIV)号决议，该项决议将一九七一年定名为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国际行动年。因而我们重申多年来所作的种种努力，试图消除这种罪恶昭彰地违犯人权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众所周知，哥斯达黎加从一开始就参加了关于南非共和国政府种族隔离政策特别委员会的工作。我们在那里和该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进行了合作，旨在寻求某种手段，以便成功地达到该委员会创立时的宗旨。

90. 然而,我们已在许多会议上多次重申:对人权的粗暴侵犯不仅发生在种族歧视的范围内。因此,我们殷切地希望能加速世界人权宣言各项基本原则生效所需的过程,这些基本原则已经完美地体现在有关世界人权的各国际协议之中。我们感到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这些为保护和加强人权的非强制性文件尚未在世界上获得相当数量国家的批准。尽管如此,我们仍希望不久就能得到足够数量国家的批准。为此,哥斯达黎加曾于一九六五年决定再次提出一项议案,该议案多年前在乌拉圭和法国的要求下曾在大会讨论过。这项议案即关于凭借联大的一项决议来建立一个促进保护人权的机构,迄今为止,这一机构的建立仍停留在良好愿望之中而没有能够实现。自从一九六五年提出该项议案以来,我们对于建立一个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关切一直是十分明显的。这项议案在第二十四届联合国大会期间终于得到实质性的研究。在第2595(XXIV)号决议中,七十三国代表团表决赞成最优先考虑继续研究这一问题;现在这项议案已列为本届联大的第46项议程。如果我们能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如果能建立一个办事处来表明联合国是关心保护一切人权的,那么我国代表团将对此感到极为满意。因此,我们希望第2595(XXIV)号决议不仅是多了一项决议而已,我们所希望的是,应十分严肃地对待其种种决定,并将予以优先考虑,以及有关委员会能及时审议这一问题。

91. 荒唐可笑的军备竞赛年年消耗两千多亿美元,再没有什么比这件事与联合国维持和平与国际安全的基本宗旨更加背道而驰的了。因此,尽管政界的“现实主义者”认为裁军仅是乌托邦式的空想,但在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却越来越成为当务之急。

92. 哥斯达黎加感到自豪的是,从一九四八年以来,我国就单方面地实行了全面彻底裁军。从那时起,我们就未花费过一分钱去维持武装部队,同时我们把反对外国侵略的我国国防寄托在现有国际公约,以及哥斯达黎加所参加的区域性机构与世界组织的效力方面。从一九四九年起,我国宪法就将军队作为我国的一种固定体制取消了。因此,我国代表团对于以任何形式限制疯狂的军备竞赛的措施,都热烈给予支持就不足为奇了。

93. 我们了解妨碍在裁军方面采取更有效的行动的种种政治原因。几天以前,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在他所发表的极其精彩的讲话中,十分正确地描述了这一现状。请允许我引用这篇令人钦佩的发言中的几段:

“我们已经谈到了建立在各集团之间均势基础上的国际秩序。要维持这种至多是不稳定的均势,需要巨额的投资来获得日益复杂而昂贵的进攻性和防御性系统。拥有原子弹一直是不断进行军备竞赛的出发点,目的在于以某种决定性的发现,或以建立某种可能具有绝对效力的物质优势来结束这种恐怖均势。

“只要拿出用于破坏性目的投资的很小一部分,就一定能够改变地球的面貌。然而,控制世界的斗争使竞争者不可能按照大家的最高利益行事。”〔第一八四一次会议,第102和103段。〕

94. 尽管遇到了种种严重障碍,裁军委员会为了至少能采取裁减军备的间接措施,作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一些非常重要的措施已获得成功,并在以下一些条约中反映出来了:如一九六三年签订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⑧一九六七年签订的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活动的条约〔第2222(XXI)号决议〕,一九六七年签订的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特拉特洛尔科条约)以及一九六八年签订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2373(XXII)号决议〕。

95. 我们已完全同意文件A/7993,在该项文件中包括被列入第二十五届大会临时议程中的一项议程,题为“关于签署和批准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第二号附加议定书的大会第2456B(XXIII)号决议实施情况”。该议定书的目的是使不属于拉丁美洲的国家承诺不在拉丁美洲领土上使用核武器。遗憾的是,至今只有联合王国遵守了第二号附加议定书,从而表明联合王国尊重我们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在世界这部分地区消除核武器的愿望。我们现在呼吁世界上其他各大国也效法英国的榜样。

96. 联合国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并未达到联合国

^⑧ 一九六三年八月五日在莫斯科签订的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

第一个发展十年所规定的目标。作为一个穷国的代表，我不能不为此感到遗憾。当我们正要讨论第二个发展十年的战略时，我国代表团愿重申以下观点：只有切实削减军费，才能使各大国腾出足够的资源来共同提高仍处于不发达状态的各国的生活水平。虽然我们各工业化国家曾反复说过，它们想将国民总产值的百分之一致力于较落后地区的发展，但由于这么多财富和自然资源集中在最热中于军备竞赛的国家手中，所以仅依靠那些不那么强大的国家的善良愿望来改善总的情况的想法，就太不切合实际了。

97. 为达到第二个发展十年的目标所作的种种努力，必须与加速裁军所作的努力紧密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将今天致力于战备的各种努力引向谋求普遍繁荣的渠道上来。这样，在缓和紧张局势的过程中也就会减少种种武装冲突，并使军备竞赛更为不必要了。

98. 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联合国进行的种种调查，今天我们知道：人类的三分之二吃不饱饭、没有象样的居住条件、没有土地、没有财产、健康也谈不上。同时我们知道，解决这种悲剧的唯一办法是增加各穷国的国民收入。但是为了要增加这种国民收入，就必须提高生产水平，而要达到这一点，只有使创造财富的种种方法更加完善才行。换句话说，就是要教育人民，以便改进他们的技术和管理的能力以及改善生产资料，包括获得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工业的机器和设备。

99. 然而，教育人民和建立现代化工农业设备就需要大量的投资。我们这些不发达国家之所以陷入了这种恶性循环的原因就在于此。因为国民收入少，所以投资不足；由于国民收入微薄，所以国民储蓄很少。这样一来，就不可能对生产设备和培训人员进行投资。因此，只有依靠大量增加额外的外来资源的捐助，才能打破这种恶性循环。显而易见，这必须得到各较发达国家的合作，这些国家的财富积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各穷国进行剥削的结果。

100. 富国给予合作使穷国得到发展虽然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但我国政府认为：加强不发达国家经济最有效的方式是，对它们的各种出口产品给予好价

钱，并解除阻碍它们进行贸易的种种限制。国民经济正同个体经济一样，提高生活水平的最好方法就是付给每个人合理的劳动报酬来增加他们的收入。

101. 几千年来，因为人们除了靠人或牲畜的体力参加生产过程而外，就再没有别的能源了，所以人类只好在贫乏的世界上生活。因此，几千年来，人们的思想总是一成不变地认为贫乏是天经地义的；认为需要节省到吝啬的程度才行；认为需要剥削其同胞才能生存下去。

102. 但是，现代技术的巨大发展已结束了那种贫乏的状况。今天，种种机器永不停息而准确无误地运转创造了大量财富。然而，人类却仍对巧取豪夺别人的财产的老一套办法恋恋不舍。

103. 一九二九年的经济大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工业生产不断增长而工资没有相应增加，农产品价格也没有相应提高。凯恩斯法则解决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提高并稳定了农产品的价格，增加了工人的工资。采取这样的措施不单使城市居民和工业人口远不至于破产，而且还能使各发达国家克服其危机，并使整个国家富裕起来。

104. 因此，从国内的情况来讲，各工业化国家不得不采取一种适应大规模生产的新体制的财富分配制度。由此可见，现代工业除非不断提高本国人民的消费水平，否则就不能继续存在。然而，工业化国家并未能在国际范围内摆脱它们的这种弊端。

105. 各富国就这样将其产品价格稳定在一定的水准上，这种水准表示其工人具有象样的生活水平。农产品的生产也不例外。例如，各工业化国家所生产的食糖和小麦在发展的水平上也具有价格稳定的优良体制。唯独各穷国人民才不得不以在“自由市场”上所能获得的价格来出售其产品。在很大程度上，这就是他们贫穷的原因。

106. 在第二个发展十年的开始，我们认为，冲破本国经济由于贪得无厌所造成的障碍的各工业化国家，决定冲破世界经济范围内的这种障碍的时刻现在已经到来了。

107. 各不发达国家是当今世界的无产阶级，农

产品和矿山的出口就成为它们的收入。各穷国只有通过提高这种收入，才能获得各富国需要在我们市场上越来越大量出售的剩余工业产品。如果再次由于国际贸易不平等而发生与此相反的情况，那就必然会出现象过去那种因国民收入分配不当和不公平所产生的种种严重经济危机。

108. 巴西代表在结束他在一般性辩论〔第一八四一次会议〕中的发言时，提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提案，这一提案尽管简单，但却意味着提出了一套完整的行动纲领。吉布森部长恰如其分地建议：我们应利用我们的组织，我们并应履行联合国宪章。作为联合国创始国之一的哥斯达黎加，将满怀信心地支持巴西的提案。

109. 主席：在我请今天下午会议上的最后发言人发言之前，我想提醒一下各位代表，本届大会在昨天的会议上决定，一般性辩论报名发言将于明天即九月二十四日下午五时截止。我还愿借此机会提醒各位代表，联合国大会过去和现在都打算至迟不超过十月二日星期五下午结束这次一般性辩论。

110. 福拉伊先生(塞拉利昂)：主席先生，我代表塞拉利昂政府和人民，借此机会，对你当选为联合国第二十五届大会主席这个崇高职位表示热烈而衷心的感谢。你的当选表示大家对你本人的敬意，同样也表示大家对你们伟大国家的敬意。自从旧金山那个时候以来，你长期参加这个世界性组织的活动，并在其中起了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你的当选，是对你这些活动和作用的肯定。这同样表明了对你的祖国那种开明传统和贵国在对待当代那些迫在眉睫的国际问题时所持的客观态度的尊重。在纪念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年头，有这样精明干练的领导，本组织感到很幸运。我们相信，凭你的丰富经验和杰出的工作，你将能非常成功地指导我们的审议工作，并将为你如此出色地代表和为之服务的国家带来更大的荣誉。

111. 我们愿向你的前任，利比里亚的安吉·布鲁克斯-伦道夫夫人表示敬意。她在任职期间干练、耐心和果断地处理了联合国大会事务，使我们的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成果。自联合国成立至今仅有的两位联

合国大会妇女主席都是从亚非国家产生的，这表明了第三世界妇女地位的重要。

112. 我们对吴丹秘书长就联合国在过去一年中取得的成就所作的报告〔A/8001〕表示祝贺。我们很感兴趣地看到他对整个世界形势所表现出的谨慎的乐观。他在报告中的判断分析尽力对世界实际情况进行了生动而雄辩的描绘。

113. 限制战略武器的会谈一直被描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重要的裁军谈判。限制战略武器的会谈、中东和谈的突破、东南亚战争的逐渐降级以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互不侵犯条约^②的签订，相当大地缓和了世界紧张局势，但是这种紧张局势并没有完全消除。尽管超级大国都已经具有从肉体上完全消灭对方至少十至十五次以上的能力，但是，它们还在继续发展新的更尖端的全面毁灭性武器。核潜力的均衡不但没有结束战争，反而造成了核僵持局面。危险性更大的常规武器竞赛使更尖端的致命武器不断生产和扩散。这对所有国家，不论是有核国家还是无核国家、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影响，并为蕴藏着核战争威胁的有限战争提供了手段。急需用来减轻人类痛苦的资金正被纳入浩大的军事预算之中。工业化国家每年大约有两千亿美元用于军备，然而他们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预算数字却不到一百五十亿美元。在签订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问题上实际上毫无进展，这种条约将确保后代人免受一场可能的全球性浩劫。部分禁试条约签订以来已经过了整整七年了；但是还有一些国家没有签署这一条约。如果要使核军备竞赛得到控制，并把人类从更多的放射性污染的危险中拯救出来，那么这些国家签署这一条约是至关重要的。

114. 我国代表团衷心欢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2373(XXII)号决议〕在今年三月五日生效。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时刻，它宣布了被称为联合国裁军十年的到来。联合国成员国对此所表示的相当大的兴趣，增加了该条约成功的希望。然而，只有普遍遵守和彻底履行该条约，才能达到其预定目的。为了防止核武器横的扩散，联合国成员国必须全面履行

^②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二日签订于莫斯科。

该条约。同时，他们也必须对攻击性和防御性战略核武器的生产加以限制，以便阻止这些核武器的纵的扩散。关于这一点，只要任何主要军事大国，特别是核大国，不签署这一条约，就不可能就裁军问题完全达成协议。

115. 中东局势继续给国际和平带来严重威胁。为了达到和平解决的目的，安理会、秘书长和他的特别代表冈纳·雅林大使以及安理会四个常任理事国都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收效甚微。随着局势的恶化，联合国的有效性受到了挑战，这样就给这个组织带来了严重威胁。已经为以色列、约旦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所接受的美国提出的九十天停火建议给中东和平带来了一线希望。尽管该地区敌对行动的停止只是暂时的，它却给雅林使团的重新活动提供了机会，并使导致和平解决的突破成为可能。我国代表团热烈欢迎这些措施以及旨在公正解决中东危机的其它种种措施，并对一切蓄意破坏为和平解决而作出的真正努力的行动表示痛心。然而，只要巴勒斯坦难民的地位问题尚未确定，只要他们的生活条件仍未得到改善，那么，在该地区就不可能实现和平。

116. 我国代表团谴责劫持民用飞机的行为，并且认为如果国际社会对此行为不采取坚决措施，人民的生命财产将会继续受到极端分子的危害。这些极端分子选择了这种不负责任和危险的方法，在全世界面前发泄他们个人或集团的不满。关于这一点，我们重申，我们拥护安理会第286(1970)号决议，并促请迅速执行该项决议。

117. 比较值得高兴的是，我国代表团欣慰地看到，一场互相残杀的斗争已告结束，这场斗争消耗尼日利亚政府的精力已经将近三年了。本月初，在非洲统一组织的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⑩上，该组织在尼日利亚与其它一些非洲国家之间进行了调解，那些国家曾与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分歧。这样就提高了非洲统一组织的威望。

118. 我国代表团认为，只有不发达问题才具有象寻求和平那样的重要性。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可

能会主要以失败而不是以成功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这就更迫切地需要我们为第二个发展十年采取更积极的措施和制定更切实的计划。我们需要一项要求穷国和富国同样给予积极合作的可以接受的全球战略。我们需要摆脱附有政治条件的援助的扼杀性恶果。我们要求把现行的不公正的贸易方式和商品价格改变得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但是，只有承认这些需要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和贫穷国家的需要，而且也是整个国际社会应当关心的人类需要时，这些需要才能有效地得到满足。这就不仅需要穷国和富国之间进行合作，而且也需要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合作。在第三次不结盟国家最高级会议^⑪上，我们的领导人已确认需要实行后一类合作，即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正如我国总理西卡·史蒂文斯博士在卢萨卡大会上的声明中所说的那样：

“我们也许不能用自己的皮靴带把我们自己提起来，但我们可能发现，如果把我们的皮靴带都合在一起，就编成了一条导致经济解放的绳梯。”

119. 现在要强调的一点是，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促进因素，我们要求工业化世界自愿积极合作，以便最终能发动一场急速直线上升的发展运动。

120. 例如，发展中国家资本明显地匮乏和短缺，而发达国家有时因资本过剩而窒息，结果，这些资本渗透到一些国家的所谓国防预算中去，而这些国家的最大需要也许并不是军事武器，而是农业的改良。情况竟然是这样，这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悲剧。另外，数以百万计的宝贵的美元、法郎或卢布竟在喧嚣的宇宙冒险中被挥霍殆尽，而把这些花费中的一个零头用于提供人们所赖以生存的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也能减轻亿万人的痛苦，这同样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悲剧。

121. 再者，尽管在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中，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超过了百分之六，然而，这一增长的收益又被发达国家贸易的巨大扩展和它们工业品价格的提高所抵消。这些因素，加上发展中国家的产品的价格有控制的下降，结果使较贫穷国家的收入

^⑩一九七〇年九月一日至三日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第七届会议。

^⑪一九七〇年九月八日至十日在赞比亚卢萨卡召开的第三次不结盟国家的国家或政府首脑会议。

能力令人失望地降低，因此，它们的总增长率也一直在下降。

122. 此外，发达国家还通过设立关税壁垒和组织保护性贸易集团的方法来经常地阻止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入它们的市场。

123. 如果经济上先进的国家继续采用这些消极的策略以反对第三世界的合法愿望和不懈的努力，那么，第二个发展十年也会很快地和第一个发展十年一样，得到一个不光彩的“失望的十年”的称号。

124. 在提供发展援助方面，人们正确地强调了通过国际机构的渠道来进行援助，以便充分发挥其作用。在这一活动中，象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机构，甚至象非洲开发银行这样的区域性机构都可以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然而，我们的观点是，为了使发展计划真正成为国际性的、客观的和确有成效的，联合国系统本身，包括其专门机构，应该起中心的和关键的作用。因此，在宣布开始第二个发展十年的时候，我们应负有责任，保证联合国继续成为国际发展的主要机构，其职能不仅要扩大，而且还要加强。

125. 我国代表团进一步希望所有的国家，不管在国内或国际上，作为全球战略的一部分，都采取适当的行动，帮助节省世界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应该认真重视人口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如贫穷国家的生活水准问题，以及特别是在较发达国家的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将于一九七二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寻求一些方法来结束掠夺我们的自然资源和随之而引起的对生命的危害方面，将迈出非常有益的第一步。

126. 在现阶段，我仅能保证我国政府支持我们所一心追求的两个主要目标，并且希望所有国家共同努力，使七十年代成为裁军和发展的十年，或者说得更带一点人道味儿，成为和平和富裕的十年。

127.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很多问题引起了联合国的注意，其中持续最久、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可能要算非殖民化问题。在纪念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通过十周年之际，仍有四十五个地区，约二千八百万居民仍然处于殖民统治之下，这对国际关系

是一个可悲的说明。南部非洲向联合国提供了这种现象中最坏的典型。非法的伊恩·史密斯少数人种族主义政权继续无视管理国和世界舆论。今年初，它根据一部非法的宪法，宣布成立所谓共和国，这就使它的对抗行为更加露骨。对此，安理会对南罗得西亚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包括扩大经济制裁、中断进出那个地区的全部现有的运输手段以及禁止在该地区设有代表机构。但是，与此同时，不是由于某些国家警惕性不够，就是由于另外一些国家未予以合作，使得南罗得西亚继续得以逃避制裁。南非和葡萄牙仍与南罗得西亚保持关系，允许后者的贸易运输通过它们所控制的地区。联合王国政府由于没有能够强使南罗得西亚接受使这个地区迅速恢复法治的条件，便辜负了那些目前已陷入伊恩·史密斯重重压迫和种族主义统治的罗网之中的非白人群众的信任。这些绝望的群众只是因为遭受严重的挫折而被迫走上极端，开展了争取解放的武装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唯一光荣的行动就是给予他们一切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援。因此，我们促请联合国，作为一个组织，对自由战士们的事业不应仅仅表示同情，而且对他们为争取解放的合法斗争还应予以资助。

128. 由联合国设置一笔殖民地解放基金是对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通过十周年的最好的纪念。我们预料葡萄牙特别会声嘶力竭地反对这一建议。但可以肯定，葡萄牙必须把提出这一建议看作是它自己盲目地坚持反对自决原则和一再声称决意用武力来统治那些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人民所造成的必然后果。尽管再三劝告而葡萄牙却置若罔闻。它拒绝了包括在关于南部非洲问题的卢萨卡宣言^⑫中的有所节制的建议，该建议要求和平地把权力移交给在它管理下的各国人民。与此相反，它却变本加厉地将镇压解放运动的军事行动升级。葡萄牙已经开始大规模地推行一种使当地居民在新的地方重新定居的政策；在此过程中，为了“惩罚”那些有时越境寻求安全的非洲民族主义者，它还侵犯了那些非洲邻国的主权。为了葡萄牙及其盟国自身的利益，人们奉劝它们，经过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领土上连续进行了长

^⑫《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四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106，文件A/7754。

达九年而又毫无获胜希望的斗争之后，对它们来说，结束这一悲剧的唯一理智的办法就是改变其政策。致力于人类尊严和自由事业的我国政府，保证采取一切行之有效的办法支援自由战士，因为我们始终坚信：只要还有一个兄弟仍然在受奴役，我们就还没有获得彻底解放。

129. 在纳米比亚，尽管联合国在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上不断采取行动，南非政府仍然极端恶劣地继续拒绝执行联合国决议。它不仅拒绝从纳米比亚撤走，而且事实上还窃取了当地居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并推行一种肢解纳米比亚的政策，把它分割成一些孤立的“家园”。与此同时，南非政府又在本国的边界之外推行罪恶的种族隔离政策。

130. 我国代表团欢迎纳米比亚问题专设小组委员会^③的成立，并欢迎国际法院应安全理事会的要求〔第284(1970)号决议〕就“南非继续留在纳米比亚对各国的法律后果”提出咨询意见所采取的迅速行动。如果不对问题预作判断，人们只能希望在这一活动中一九六六年不了了之的情况不再重演。

131. 目前有一种倾向，就是只重视南部非洲殖民统治的这些明显事例，而忽视了世界上其它地方的同类情况。在这里，我不得不指出，所有殖民地的解放都是同样重要的，也必须用同等的精力来对待。

132. 让我在这里对将于十月十日获得独立的新国家斐济预先表示欢迎和祝贺。我们希望在这方面历史将继续重演。

133. 人权问题和非殖民化问题紧紧地交织在一起，因为自由，无论是民族的自由或是个人的自由，是不可分割的，这是一条不言而喻的真理。今年，联合国在实现人权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区域性的讨论会已经召开，其中也许需要特别提一提的是专门讨论关于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和社会权利的人权讨论会。^④这次会议把当前具有燃眉之急的两个问题，即发展问题 and 人权问题结合在一起，并把发展中国家的

注意力集中到这两个问题上，因而这次讨论会成了今年重要的事件之一。

134. 然而，尽管如此，在人权方面取得进展的总的情况还远远不足以令人鼓舞。现在批准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2200 A (XXI)号决议〕的国家还不到十个，而现有的公约又未得到全面执行。例如，根据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2106 A (XX)号决议〕授予任何个人以呈诉权利的任择条款，至今还没有任何国家签署承认。我们迫切希望通过对设立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建议的普遍支持，将使这次值得纪念的会议更加令人难忘。

135. 当然，希望通过这样一个高级专员的努力就能够消除当代对人权的最大挑战是一种空想。我指的是南非局势，在那里，联合国大会、安理会、非洲统一组织和各个国家所作的一切努力都遭到了拒绝。在此，我只得不厌其烦地重申我国政府对南非政府的种族主义政策的深切关注。

136. 南非在联合国内充分享有会员国资格的同时，却无视联合国宪章规定，无视世界人权宣言，继续维护其种族隔离和镇压政策，竭尽全力消灭那些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人。这也象罗得西亚的情形一样，下定决心的人民的意志现在几乎已经爆发成为暴力革命，给整个非洲大陆带来了种族战争的威胁。正是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才以严重关切和不安的心情注意到这样一种情况：据报道，不管出于什么动机，英国政府打算恢复向南非出售武器。因为我们相信，该政权所得到的每一件武器都要进一步致命地损害人类尊严、个人自由和人类平等的观念，并对国际和平造成一种真正的威胁。

137. 在我们庆祝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之际，如果我们在思想上进行严肃的自我反省，那也并无不当之处。我们认为，联合国仍然是人类谋求互相磋商以期协调一致和谋求国际和平与普遍繁荣的主要希望；但是，除非我们着手对联合国的机构和职能进行实事求是的重新估价，以便提高它的有效性，否则这些理想仍然会落空。

138. 联合国成立以来的这段时间里，它的会员国的组成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联合国预期需要

^③为实施安理会第276(1970)号决议而设立的专设小组委员会。

^④该讨论会于一九七〇年六月二十三日至七月四日在赞比亚卢萨卡举行。

解决的问题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只有大力改组，才能使这个组织足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并具有充分的普遍性，以满足今天的根本需要。为了使它真正地适应时代的发展，我们认为青年一代应作好参加领导工作的准备，因为将要担负起世界事务责任的最终正是他们。因此，我们积极全力支持七月份在联合国总部召开的世界青年大会。要尽早地让青年体验一下各国际组织及其问题的复杂性，应该鼓励青年在作出公正的决议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139. 当世界人口的相当大的部分被置于联合国之外的时候，这个组织就不能说成具有真正的普遍性。不能无限期地忽视拥有七亿五千万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尤其当这个国家是一个核大国的时候，更是如此。被分裂的朝鲜、越南和德国，正是由于他们没有参加联合国，也使我们组织的效力越发减低。只要有可能，我们盼望那些国家能尽快地实现和平统一。

140. 二十五年来，这个组织处理了一些人类面临的问题——举几个例子，如政治、经济、社会 and 殖民问题——这些问题往往会破坏人类非常喜欢保持的有秩序的生活方式。我国代表团希望在回顾过去的同时，使我们国家和我们自己能重新致力于摆在这个世界组织面前的伟大任务，以实现宪章的崇高理想。

141. 最后，我们认为全世界各国都必须维护宪章的理想。因为这是我们能够保证这个组织的继续存在和人类生存的唯一道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裁军和发展的目标作为真正的普遍理想来追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共同人性的推动下和在世界和平最终目的鼓舞下，有希望真正团结得象一个人类大家庭一样。

下午五时十分散会

第一八四八次会议

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四日星期四上午十时三十分纽约

主席：爱德华·汉布罗先生(挪威)

议程项目 9

一般性辩论(续)

1. 主席：现在请冈比亚共和国总统达乌达·K. 贾瓦拉爵士阁下讲话。

2. 贾瓦拉总统：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对你当选为联合国大会第二十五届常会的主席表示我个人的热烈祝贺。我毫不怀疑，由于你的智慧和在国际外交活动中的丰富经验，你不仅将在这个崇高职位上发扬你杰出的前任们的传统，而且将在本届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会议期间引导大会取得更为重大的成就。

3. 我同样愉快地对你的直接前任安吉·布鲁克

斯-伦道夫夫人表示我诚挚的祝贺和感谢。她在处理第二十四届常会的各项事务时，谙练灵活。这不仅给她自己而且也给她们的伟大祖国利比里亚共和国带来了信誉，实在说也是给整个非洲赢得了信誉。

4. 在此值得纪念的重大时刻，我也愿向我们的秘书长吴丹表示敬意，并向那些在他之前曾担任过这个困难的、而且常常是劳而无偿的、但却从来是极为重要的职务的人们表示敬意。我愿对已故的特里格夫·赖伊先生表示崇敬和怀念。他在联合国初创时期曾肩负过行政和政治事务的千钧重担。我还要对另一位斯堪的纳维亚的优秀儿子达格·哈马舍尔德先生表示崇敬和怀念。他孜孜不倦地、忘我地为本组织服务，最后为了给我们的大陆寻求和平而献出了生命。联合国在其发展过程中的当前这一特别时刻，有如吴丹这样一位才德兼备的人做秘书长实在是幸运。他难能可贵地把耐心、谅解的德性同坚毅、公正的品质结合了起来，所以他不断地提高了我们这个组织和他的